

马克思人口理论视域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 缘起、脉络与中国化^{*}

李海洋¹，韦弋昌²

(1. 安徽公安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合肥 238000; 2. 安徽三联学院 新商科学部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受阶段性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社会转型等诸多因素影响，我国人口结构问题逐步显现，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既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本研究力图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视角探讨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通过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梳理马克思人口理论在老龄化语境下的相对过剩人口、两种生产、人的自由发展等问题，进一步探讨西方应对老龄化理念的经验与不足的同时，立足国情，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应对因人口结构失衡导致的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人口老龄化；结构性失衡；积极老龄化；中国方案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25) 05-0071-09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5.05.008

党的二十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而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中，老年人口占比正不断攀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接近 2.1 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 14.9%（见表 1），老龄社会形态浮现。^②事实上，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世界人口结构转变的重要趋势与社会现象，对经济发展与资源分配带来巨大冲击。如何客观认识老龄人口、老龄社会，科学处理老龄化带来的各项挑战，各国政府与学术界在不同阶段给出了不同“药方”。^③

表 1 2022 年年末我国人口年龄构成

指标	年末数（万人）	比重（%）
全国人口	141175	100.0
其中：0-15 岁（含不满 16 周岁）	25615	18.1
16-59 岁（含不满 60 周岁）	87556	62.0
60 周岁及以上	28004	19.8
其中：65 周岁及以上	20978	14.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作者简介】**李海洋，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公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学；韦弋昌，男，安徽亳州人，安徽三联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学及财务管理。

【基金项目】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基于公安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障体系构建研究”（2023sxzzjy071）；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意识形态视域下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现状与改善策略研究”（SK2021A0796）。

①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B/OL]. (2022-10-16) [2023-08-10]. 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② 陆杰华, 林嘉琪. 重度老龄化社会的人口特征、风险识别与战略应对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3 (1): 59-68;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B/OL]. (2023-02-28) [2023-08-11]. 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

③ VANHUYSE P, GOERRES A. Ageing Populations in Post-Industrial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Policies and Politics [M]. London: Routledge, 2013.

相较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蕴含着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如“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①进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明方向,即“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与我国人口老龄化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的整体化、系统化判断与战略举措,内涵丰富、意蕴深厚。然而,由于老龄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此前并未出现过的新的人口结构与社会形态,在观念认知、资源配置、应对措施上,不同国家与学者存在诸多差异。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党和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作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装,目前还少有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人口理论角度剖析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理论脉络与客观实践。仅有少数研究基于马克思人口理论讨论了计划生育阶段人口控制的重要性,并未充分考虑迈入老龄社会面临的人口结构新形势,^②或仅仅初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论启示。^③大多数研究还是依托于西方老年学相关理论,大致挪用其他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忽视了中国迈入老龄社会的诸多特殊性。^④因此,本文尝试在马克思人口理论视域下系统探析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现实缘起、理论脉络与本土化实践,以期梳理出老龄化语境下的马克思人口理论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的独到之处。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人口老龄化通常是指由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以及观念变革,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生育水平下降,一个国家或地区内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持续上升的动态过程与社会现象。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是与现代化进程相伴而来的社会发展现象。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⑤西方社会的老龄化始于 19 世纪末,在 20 世纪下半叶加速,是与其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依次推进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在国民财富积累的基础上渐近的演变过程。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同样伴随着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但由于后发式的社会快速转型及庞大的人口基数等特征,人口老龄化结构转变更为复杂。那么,我国人口老龄化具备哪些显著特征,其社会形态如何?具体而言,

一是,老龄人口规模庞大,少子化、老龄化增速显著。截至 2022 年末,我国 60 岁以上老人达 2.8 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约 19.8%;65 岁以上老人业已接近 2.1 亿人,占比达 14.9%。与此同时,据联合国《2023 世界社会报告》显示,截至 2021 年,全球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7.61 亿。^⑥就此来看,中国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占全球老龄比重已达 27.6%,规模庞大。另一方面,2022 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0.60‰,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这与我国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密不可分,据统计,2020 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已下降至 1.3 的极低水平,少子化特征持续加重。同时,比较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如图 1 所示,2000—2010 年我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上升了 3.23%,而 2010—2020 年间,这一比例加速到 5.44%,老龄化速度加快。^⑦

① 新华社. 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EB/OL]. (2021-10-13) [2023-08-10]. 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13/content_5642301.htm.

② 郑志国. 马克思主义人口观及其现实意义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9 (9): 42-48.

③ 胡显海, 蒋若凡.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对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启示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5): 102-110.

④ 朱荟, 陆杰华. 老龄社会新形态: 中国老年学学科的定位、重点议题及其展望 [J]. 河北学刊, 2020, (3): 11-18.

⑤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卷 5 [M]. 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⑥ UN DESA PUBLICATIONS. World Social Report 2023: Leaving No One Behind In An Ageing World [R/OL]. (2023-01-12) [2023-08-11]. <http://desapublications.un.org/publications/world-social-report-2023-leaving-no-one-behind-ageing-world>.

⑦ 王军. 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及其人口发展战略 [J]. 开放时代, 2023, (4): 1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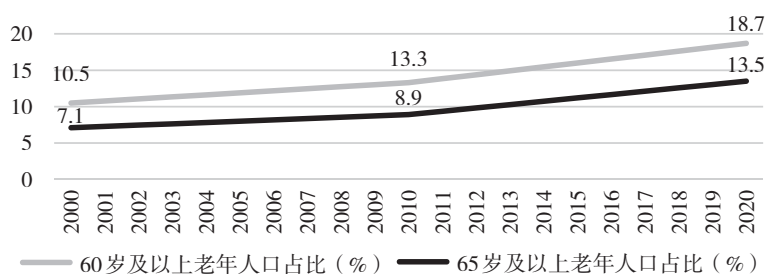


图1 2000年—202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情况

二是,未富先老、未备先老,但老龄人口素质跃升。2000年,我国刚迈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仅为2194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远低于发达国家同老龄阶段的国家财富水平。并且,相应的养老与医疗保障体制尚未健全,体制内外、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凸显。但是,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人口综合素质不断提高,老龄人口人力资本增量不断扩充。譬如,人口健康素质持续改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到78.2岁,趋近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到9.91年,排除不可抗因素,预期到2035年将增长到12.3年。^①

三是,城乡倒置的老龄格局持续强化。我国人口老龄化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城市老龄人口比例低于乡村,在老龄人口增速上,城市老龄增速也显著低于乡村,呈现出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格局。^②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格局并未伴随城市化进程衰退,反而出现持续自我强化。这与我国不充分的市民化相关,即在乡城迁移中,老龄流动人口并未获得城市居民身份,不得不返回乡村养老,而持续的人口迁移,为城市带来不断的年轻人口,城乡老龄分布不均衡、倒置的格局进而持续强化。

因此,即使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性新常态,但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具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紧密相关的,即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性,更突出基于我国基本国情的特性,进而要求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③

二、老龄化语境下的马克思人口理论

当前,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不断深化的过程,进而决定了必须构建起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中国特色的老龄社会文明。^④这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加以重新审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指导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相关举措。虽然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人口结构并未老化,但人口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反而随着现代化的加速,持续凸显。^⑤因此,即使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并未预见人口老龄化危机,但马克思有关人口的诸多讨论即马克思人口理论及其背后蕴含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仍然可以有效回应老龄化状况。

(一) 相对过剩人口的演变

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马克思便将人口规律与资本逻辑紧密结合。譬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其明确阐述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相配套的人口规律,即“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在于寻求最大化利润,而这一过程会导致机械化和自动化,从而减少对人力的需求。这种“过剩”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求相对应的。在当代,受西方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推动,相对过剩的人口依然在不断涌现。但有所不同的是,随着全球人口老化的趋势,我们发现这种相对“过剩”

① 金牛,原新.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维度[J].社会发展研究,2023,(1):38-54.

② 林宝.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普遍性与阶段性[J].人口研究,2018,(3):38-50.

③ 胡湛,彭希哲,吴玉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J].中国社会科学,2022,(9):46-66.

④ 李程骅,张钊.中国式现代化与老龄社会文明建构[J].江苏社会科学,2023,(2):1-10.

⑤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卷8[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⑥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卷5[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的形态已从年轻劳动者转向老龄化人口。因此,从资本积累的普遍规律来看,老年人口的相对过剩问题可以概括为:资本增长与其对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的需求之间的不平衡。

事实上,在马克思时代,西方社会的整体人口结构偏年轻,资本生产能力的扩张带来的对象化世界还没有充分涵盖老年人口。但是,考虑到在现实的经济循环中,资本流动的不稳定和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使得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因此,为了追求最大的生产效益,资本开始将老年人视为“非必需”,甚至是生产的“负担”。这与现代社会中对老年人的消极观念,如认为他们是不断衰老和生产效率不断下降的群体,以及资本对他们的标签化(退休、非劳动力)是一致的。就此而言,人口结构问题和老龄化压力与马克思描述的“过剩人口”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不是因为人口老化被判定为相对“过剩”,而是社会生产关系没有给予他们恰当的地位,如市场经济下普遍的年龄歧视。

(二) 两种生产的老龄变革

人口老龄化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生物或社会现象,而是与社会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紧密相关的。因此,与传统人口观念(如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不同,马克思不将人口增长视为导致贫困的主因,而更聚焦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与不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价值经常与其生产性直接相关,这使得老龄人口在生产活动中的角色被边缘化。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中,这对应着所谓“两种生产”理论。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①具体到老龄社会,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将发生变化,对于医疗、健康和养老服务的需求持续增加。同时,涉及人自身的再生产,老龄化也反映了人类自身生产方式的变化,即生育模式的转变(如生育意愿下降、少子而非多子),以及与之相关的家庭(如家庭结构小型化、独居老人增多)和社会结构的变革。

(三) 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援引自《恩格斯致朱泽培·卡内帕》的经典表述深刻刻画了“人”作为马克思人口理论的核心地位。因此,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如何保障老年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了一个核心议题。承接上文,如果我们接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社会不公的观点,那么为了解决老龄化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关注经济上的支持,更应该关注如何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的是能够适应其生产关系的劳动力,故资本主义倾向于推进一种以技能和职业为中心的教育,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对于老年人,这种偏见更加明显,譬如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常被认为是过时的,不再符合现代生产的需要。

但是,如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言,“人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人的发展超越了单纯的物质需要,涉及文化、教育和个人自由的全方位发展。^③就“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言,老龄化带来社会与经济挑战(如医疗资源需求的生长、退休金的分配)的同时,社会也需要改变对老龄人口的认识,将其视为经验丰富、有智慧的个体,可以为社会贡献宝贵的资源,应当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其次,“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人生不仅仅是年轻时期的活跃和生产。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生命中的中老年阶段变得同样重要。在这一阶段,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反思自己的生活、追求个人兴趣和学习新技能。老龄化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在不同的生活阶段中都能充分展现自己的价值。在更深层次上,随着人们对生命的不同

①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②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卷 10 [M]. 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③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卷 1 [M]. 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阶段的认识加深,我们开始重新评估生命的意义。老年阶段不再仅仅是生命的衰落,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有机会学习、成长和分享的积极阶段。

三、积极老龄化的理论脉络与局限

通过梳理了老龄化语境下的马克思人口理论,可以发现,免除相对“过剩”歧视,响应两种生产的变革,追求“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是其追求的发展目标。而这,进一步与倡导“健康、参与、保障”为核心的“积极老龄化(Active Aging)”理念不谋而合。作为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核心概念与重要举措,“积极老龄化”从观念走向政策实践,但由于资本主义局限,实践中仍陷于老龄化的泥潭。^①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梳理其理论演进,并结合马克思人口理论讨论其话语局限。

(一) 积极老龄化概念的理论演进

在西方社会迈入人口老龄化早期,老龄人口普遍被视为社会发展的负担。譬如,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奠定了退休政策的合法性,其主张随着年龄增长,老龄人口逐渐从社会角色与职责中撤离,从而带来社会抚养压力加大、加剧代际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脱离预示着人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作为对脱离理论的回应,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主张,为了有意义的“生活”,老年人需要保持与社会的连接并参与各种娱乐和社会活动,这也引发了一系列“更好地老化(Aging well)”的相关理论,逐步扭转老龄作为社会负担的论述。^②然而,这种过于美化老龄的观念,忽视了老龄人口可能面临的健康或经济障碍。诸如,20世纪80年代,先后兴起的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与生产性老龄(Productive Aging),其背后蕴含着当人口老化的同时,仍旧保持着壮年时期的活力,其本质是对正常的老年期及其自然衰落的忽视,因此,学界开始呼唤更为折中、操作性更强的理论。^③

延续并发展上述讨论,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倡导下,积极老龄化作为全新的老龄化概念得以不断丰富。2002年,积极老龄化作为一项政策框架,被世卫组织完整地提出,其将积极老龄化定义为:“通过改善老龄人口的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促进其生活质量的提升”。^④进而,“健康、参与、保障”作为3项核心指标,不断促成各国政府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与战略。作为一项整合性的概念框架,积极老龄化有力地挑战了将老龄人口视为被动依赖者的消极老龄观,指向了老龄人口作为完整公民的基本权利。^⑤

具体而言,在积极老龄化的框架下,“健康”不仅是指生物医学上的身体健康,而且包括了心理、社交和精神健康。“参与”则不仅是指经济活动,如就业或志愿者工作,还包括社交、文化、学术和公民活动。这意味着老年人应该有机会并被鼓励在多个领域做出贡献。最后,“保障”指向了为老龄人口提供经济安全、社会服务、医疗保健以及法律权益的保护。

(二) 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话语局限

然而,恰如马克思强调的,“国家制度只不过是政治国家与非政治国家之间的妥协,因此它本身必然是两种本质上相异的权力之间的一种契约。”^⑥在资本主义社会,积极老龄化作为社会政策的潜力未能得到有效挖掘。既由于狭隘的资本逻辑与工具理性的主导,过于强调老龄人口的生产性价值,又由于西方社会,特别是欧洲政府,仍根深蒂固地持有对老龄化的消极偏见。^⑦进一步,我们需要依靠基于政治经济学、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批判老年学(critical gerontology)反思为何资本主义社会下,其福利政策仍无

① OLIVERA J. Ageing unequally in Europe [J]. Socio-Economic Review, 2022, (1): 401-422.

② ESTES C L, SWAN J H, GERARD L E. Dominant and Competing Paradigms in Gerontology: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Ageing [J]. Ageing and Society, 1982, (2): 151-164.

③ WALKER A. A strategy for active ageing [J].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2002, (1): 121-139.

④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WHO/NMH/NPH/02. 8 [R/OL].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2023-08-05]. <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67215>.

⑤ HAMBLIN K A. Active Ageing: Origins and Resurgence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3: 7-28.

⑥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卷3 [M]. 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⑦ 沃克艾伦, 朱火云. 从概念到政策: 积极老龄化再认识 [J]. 社会保障评论, 2023, (3): 49-61.

法落实积极老龄观。^①

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老龄社会的劳动秩序、道德观念和日常生活惯习均根植于资本主义内生的经济机构中。因此,市场常常被视为最佳的资源分配机制,进而导致福利政策制定经常受到短期经济利益的驱使。在新自由主义视角下,个人作为养老责任叙事的主体凸显。同时,市民社会的发达,迫使国家在场的重要性下降,进而,老龄人口必须通过物质交往的形式,向国家之外的市场寻求秩序保障。^②因此,积极老龄化更多表现出生产性老龄化的面向,参与也被消解为老龄人口的劳动参与,以进一步缓解社会负担、维护资本意志。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政策制定者常常倾向于将老龄人口简化,忽视了其作为“规定和关系的丰富总体”,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③。对此,批判老年学(critical gerontology)主张应当重新审视老龄人口背后的阶级不平等状况,譬如,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不平等资源分配可能导致福利政策过于偏重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而忽视了弱势和边缘化的部分老龄群体。对于他们而言,走向局限的生产性老龄成为必然。^④

最后,在资本主义社会,老龄人口对“美好生活”的自我确证事实上被隐形排除于积极老龄化实践之外。^⑤在资本逻辑下,人的价值主要基于其在经济生产中的角色和贡献。这导致了一个偏见,非健康、非生产性的老龄人口可能遭受歧视,源于资本的保障也聚焦于老龄人口生命早期的资本积累,进而导致不同社会阶级不平等的商业保障的合法性。因此,在高度商品化和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老龄人口往往只是在迈入老龄这个截面被要求以积极老龄化。^⑥这种情况下,由于老龄人口与年轻群体(即生产性群体)的社会需求差异,产生了两者迥异的生命历程与代际紧张。如果老龄人口所追求的“美好生活”被年轻群体视为次要或不切实际,老龄人即将会在实践中被排除。

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

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我国面临更为复杂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场景与要求。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独有特征,即各种复杂情境叠加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必将走向系统化、整体化的老龄社会治理道路;另一方面,在中国,人们普遍期望国家能够引领养老事业发展,以满足社会主义的要求。^⑦因此,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实践,“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厚植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同本土化实践以及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的历史基质之上,进而在观念渊源、战略内涵与实践选择上均尽显中国方案的东方式异质性。

(一)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观念渊源

作为国家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观念,可以追溯其传统文化、家庭伦理以及政策惯性的多重渊源。首先,受儒家文化影响,我国历史上就积累了深厚的养老、孝老、尊老、敬老的文化传统,积极主动保障老龄人口是题中应有之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① VAN DYK S. The appraisal of difference: Critical gerontology and the active-ageing-paradigm [J].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014, (31): 93-103.

② 林进龙,穆光宗. 生产性老龄化:反思、超越与中国化[J]. 探索与争鸣, 2023, (3): 118-131.

③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卷8[M]. 中央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④ MOULAERT T, BIGGS S.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policy on work and retirement: Reinventing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tive ageing and mature subjectivity [J]. Human Relations, 2013, (1): 23-43.

⑤ PFALLER L, SCHWEDA M. Excluded from the Good Life? An Ethical Approach to Conceptions of Active Ageing [J]. Social Inclusion, 2019, (3): 44-53.

⑥ DANNEFER D. Systemic and Reflexive: Foundations of Cumulative Dis/Advantage and Life-Course Processes [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2020, (6): 1249-1263.

⑦ 陈友华,孙永健. 中国福利制度建设:本质、问题与老龄化应对[J]. 江海学刊, 2022, (6): 107-115

德。要把弘扬孝亲敬老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建设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的孝亲敬老文化。”^①其次,家庭伦理更是极具中国特色,来自家庭的支持仍是保障老龄人口基本养老与照料的主要来源。相较于西方文明的“原子化的个人”,中国人围绕家庭而凝聚,家庭成员之间的传统互助网络并未因为现代化进程而溃散,反而更显其韧性所在。一方面,老人获得子女的代际反哺,另一方面,子女也收获老人的家务协助、隔代教养,呈现出双向代际支持的特征,这是自然而然的主动应对措施。^②习近平总书记素来重视家风建设,特别强调,“要加强家庭建设,教育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立良好家风,巩固家庭养老基础地位。”^③最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富含政策惯性,党的人口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主线,不断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的老龄人口需求。一张蓝图绘到底,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现在养老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央非常重视,正研究措施。”^④此后,养老保障工作不断被摆在突出位置。2021年,重阳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更进一步批示,“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⑤应对举措续深化,政策延续性凸显。

(二)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内涵

细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可以发现其意蕴深厚。虽然,相较于“积极老龄化”概念而言,仅仅多了四个字,但一字千钧,深刻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道路自信。对此,我们可以从“积极”“应对”与“人口”3个核心字词展开讨论其战略内涵。

首先是,“积极”,一方面从词义本身来看,“积极”蕴含锐意进取、全力以赴之意,进而对推进老龄事业与产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更看重实践成效而非表面概念;另一方面,“积极”也是看待老龄人口、老龄社会的一项核心观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要言不烦,指出“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是仍然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的重要人生阶段”,要“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努力挖掘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的活力和机遇”。^⑥其次是,“应对”,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加强老龄工作提出的3个应对展开,即“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⑦。就“及时应对”而言,人口老龄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和规律,考虑到我国老龄化增速迅猛,及时抓住快速老龄化初期的窗口期,为即将到来的老龄化高峰做好完备措施;就“科学应对”而言,一方面凸出应对人口老龄化决策的科学性。前提是结合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与中国实际,科学掌握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与影响,有的放矢、精准施策;另一方面,要通过科技创新,不断完善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优化资源配置。就“综合应对”而言,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叠加了诸多复杂社会情境,因此,在应对层面,需要综合、系统推进。其关键在于,全面统筹、协调可持续,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坚持过程调节与结果干预相结合,系统有序地开展老龄工作。^⑧最后是,“人口”,即既包含积极应对个体老龄化,也涵盖积极应对群体老龄化,这是对“积极老龄化”仅仅局限于个体层面的理论创新。就“健康、

① 习近平. 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B/OL]. (2016) [2023-08-02].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28/c_1118948763.htm.

② 程胜利. 家庭还是社会:谁应当承担当代中国养老服务的责任 [J]. 广东社会科学, 2016, (4): 203-210.

③ 习近平. 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B/OL] //新华网. (2016) [2023-08-02].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28/c_1118948763.htm.

④ 习近平. 全社会一起努力把老年人照顾好 [EB/OL] //新华网. (2013) [2023-08-11]. https://www.gov.cn/ldhd/2013-08/30/content_2478146.htm.

⑤ 新华社. 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EB/OL]. (2021-10-13) [2023-08-10]. 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13/content_5642301.htm.

⑥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卷3 [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

⑦ 新华社. 习近平对加强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重大政策制度及时科学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 [EB/OL]. (2016) [2023-08-11]. https://www.gov.cn/xinwen/2016-02/23/content_5045223.htm.

⑧ 林宝.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内涵、目标和任务 [J]. 中国人口科学, 2021, (3): 42-55 + 127.

参与、保障”“三支柱”而言，也赋予了新的战略内涵，即推进全民健康、全民参与以及全面保障。^①此外，在目标设定上，积极应对个体与群体兼顾的老龄化，要求满足各方主体共同参与、共同解决老龄化挑战，进而实现“让发展成果人人共享”的目标。^②

(三)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实践选择

当前，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业已取得初步、显著成效。归根结底，这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实践选择紧密相关。对此，下文从构建一个格局、确立两个理念、实现 4 个转变具体展开。

首先是构建老龄事业与老龄产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养老事业发展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养老产业兴旺以把握人口老龄化机遇。养老事业满足老龄人口的基本养老需求，产业则满足其多样化、个性化的养老需求，两者协调发展，进而满足老龄人口持续增长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外，要以养老事业带动养老产业，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养老服务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财政资金来购买，但也要借助政府项目来完成启动，最终要引导市场自主化消费，不断地拓展服务对象，老龄产业才有长久的生命力。

其次是确立积极老龄化与健康老龄化理念。将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这是推进人口老龄化战略与健康中国战略的必然要求，以促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低成本、高效益。积极老龄化是这一战略的核心，与健康中国战略相交汇形成健康老龄化。在具体实践中，培育积极老龄化观念能有效激发老年人的生产力，激发老龄社会活力。同时，健康老龄化能提升整体人口健康，减少老年疾病、残障，降低老龄化的沉没成本。

最后是实现“四个转变”。具体包括，“适应时代要求创新思路，推动老龄工作向主动应对转变，向统筹协调转变，向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转变，向同时注重老年人物质文化需求、全面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转变。”^③以上四个转变，也是新时代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行动指南与工作方针。“推动老龄工作向主动应对转变”，要求我们提前研判、未雨绸缪；“向统筹协调转变”则强调老龄工作需要更高层次的资源整合和协调治理；“向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转变”进一步突出养老准备不再仅是老年人的事情。从年轻时开始，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养老的重要性，并做好相应的准备；“向同时注重老年人物质文化需求、全面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转变”提出更进一步要求，不仅要关心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还要关心他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这也昭示着老龄人的全面发展。

五、结语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视域出发，系统探讨了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理论渊源与实践路径。通过梳理马克思人口理论在老龄化语境下的时代价值，比较分析积极老龄化理念的理论局限，最后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应对因人口结构失衡导致的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把人口现象、人口过程和人口规律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考察，从而科学地阐明了人口发展、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从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视域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及其未来发展趋向，还需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相适应。根据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之间需要相互适应。这意味着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需要注重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以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提高养老金水平，改善

① 韩烨，沈彤. 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逻辑起点与规划远景——从“积极老龄化”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J]. 学习与探索，2021，(3)：29-35.

② 王晓峰，刘华伟.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模式 [J]. 人口学刊，2023，(1)：11-15.

③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 [EB/OL]. (2021)[2023-08-02].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1/24/content_5653181.htm.

医疗保健条件, 以确保满足老年人的高质量生活需求。

二是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 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变革, 未来的社会可能会更加注重智能化、自动化和信息化, 比如智能投递、无人驾驶等, 这可能会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构产生影响。因此, 需要加强对老年人的教育培训, 提高他们的技能和素质, 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三是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强调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的重要性。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 需要注重优化人口结构, 提高人口素质。这包括鼓励生育、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健康促进等方面的工作。同时, 也需要关注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影响, 促进代际和谐和社会团结。

四是社会公平正义。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 需要确保老年人的权益得到保障, 避免出现贫困、孤独和社会排斥等问题。同时, 也需要关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 采取措施促进社会公平和包容。

五是国际合作和交流。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认为, 人口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 需要国际合作和交流来共同应对。在未来,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国际间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合作将变得更加重要。这可能包括经验分享、技术合作、政策协调等方面的内容。

总的来说,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我们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未来发展趋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未来, 我们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以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展望未来, 老龄化作为一个长期的社会过程, 需要我们继续借鉴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应对实践, 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国情, 特别是解决好“相对过剩”群体的合理定位问题。同时, 在参考国际经验时应保持清醒头脑, 避免简单挪用, 遵循“两个结合”, 创新性地建构中国特色老龄化发展道路。只有这样, 才能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的辩证统一, 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人口保障。

Active Response to Population Aging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pulation Theory: Origin, Context, and Sinicization

LI Haiyang, WEI Yichang

(1. Marxism College, Anhui Police College, Hefei, Anhui, China 238000;

2. New Business and Science Department, Anhui Sanlian College, Anhui, Hefei, China 230601)

Abstract: Influenced by a myriad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phased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societal transition, China's population structure issues have gradually come to the fore, with the situ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Addressing the issue of population aging is not only a significant strategy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but also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realiz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vantage of Marxist population theor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approach for China's strategy in proactively addressing population aging. It dissects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and delves into Marxist population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aging, focusing on aspects like the relative surplus population, dual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While analyzing the experiences and shortcomings of Western aging concepts, it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basing solutions on China's unique national circumstances and paves a distinct path to alleviate the population aging crisis and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China's demographics.

Key words: Marxist Population Theory; population aging; structural imbalance; proactive aging; Chinese approach

(责任编辑: 阮明阳)